

全过程民主在我国生态安全治理中发挥的优势

王子懿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南京 211816

摘要: 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风险问题是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焦点热点和世纪难题,生态灾难频发将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空前凸显。因此,推动我国生态安全建设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之一。生态安全问题与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紧密结合的特点,要求我们重视利用全过程民主的制度优越性,克服西方生态政治的局限,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安全型社会。

关键词: 全过程民主;人民民主;生态安全;生态治理;生态文明思想

The whole-process of democracy plays its advantages in China's ecological security governance

Ziyi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1816

Abstract: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are the focus of high attention and the problem of the century, the world, frequent ecological disasters will be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ssues unprecedented prominent.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ssues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national security requires u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whole-process democracy,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ecological politics, and build an ecological security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whole-process democracy; people's democracy; ecological security; ecologic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文艺复兴以来,凭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发优势,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垄断”了民主的定义,片面强调以“普选制”和“党派化”特征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逻辑的优越性,将多元化民主实现形式和实现机制单一化,形成了当代西方学者定义政治体制是否民主的话语霸权体系。但这种话语体系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在实践中表现出的片面强调形式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僵化问题。而在生态治理领域,部分西方国家继续沿用其传统的民主模式形成“绿化的代议民主”模式以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实质上仍是一套以“功利”和“权利”的视角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范式。

1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在应对生态安全议题上的实然缺陷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中,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在政治生活中虽然表面上享有广泛的民主政治权

利,但实质上仍是少数民主、精英民主,尤其是对于他们引以为傲的选举制度受到资本的严重干预。“多党选举制度是资产阶级将资本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的最佳途径。”^[1]“一旦选举结束,所谓的‘民主’仪式也就结束了。”^[2]

在意识形态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上构造了一个代表全体国民的“超阶级国家”的“想象共同体”,便于资产阶级在此基础上进行统治。资产阶级统治者通过“人民主权”、“法律至上”、“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权力理念赋予其政权以超越阶级的合法性,维护其统治权力和社会秩序。构建了以宪政为核心的“三权分立”体制的政治上层建筑实现机制,成为“许多人基于法权的一致性和利益的共同性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3]。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一根本矛盾被异化为“超阶级状态”的“想象中的共同体”与现

实中存在的阶级本质之间的矛盾。

在运行管理机制上，“实现公共利益”这一借口成为了建立社会政治规则和经济运行秩序的手段，被资产阶级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对人民实行现实的统治。处理这些公共事务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需要，也是国家“公共权力”必须存在的最重要原因。^[4]然而，在建立和解决这些公共事务的问题上，所有的阶级都从自己阶级的利益出发，形成多样化的政治主张，从而使“公共权力”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质。由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主导着处理这些企业公共事务的权力，从而可以制定一个符合其阶级意志或其统治集团利益的生态法律、生态制度和生态政策，对人民进行现实统治。例如，自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以来，一些西方政客故意淡化了病毒的危害，转移了矛盾，以保障资产阶级的资本再生产需求，目的是实现维护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政治目标。由此可见资产阶级主导的国家权力以“公共利益”为名却以谋求利益集团自身权力为实的现状，这体现出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阶级性和局限性。

在实现机制上，参与程序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程序，广义上主要包括各种选举、投票和各类政治团体活动。竞争程序是指狭义的选举和考试，其特点是一定的规则和随机的获胜者。制衡程序可以通过公民在“个人—国家”层面的言论自由发展影响政府的决策议程。^[2]为了确保整个机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有各种补充程序，如定期选举、司法独立、示威权和独立社会团体等。这些方案的设计和建设的目的是弥补制度的不公正，但其具有本质的局限性。一方面导致大量激进环保主义者和激进环保组织的产生，其普遍特点是宿命论的环境观点和不接受任何其他解释或中间地带的指导方针，采取了大量“行为艺术”式的抗议和示威行动，而事实上很难对环保建设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另一方面对大量普通民众而言，环保主义也会相应地与政客的政治倾向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种关于环境保护主义和激进右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异化了生态本身的“公益性质”。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可以被普遍视为运用实用主义的策略。其逻辑是，民主被视为一种可操作的工具，而环境被视为一种公共事务。它必须首先转化为政策问题，然后形成公共政策，最后由政府推动实施。政府为了通过民主管理手段使决策合法化推出一系列相关政策工具，形成了一种政府机构内外互动的民主行政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注重环境问题本身具有的特殊性^[3]，并且其基础的政治框架仍然是一种执政体制，这种执政体制本质上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并

不能为解决生态安全问题提供必要条件。

2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生态文明现代化、生态安全建设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因不同国家所面临的人口规模、历史文化问题、国际社会环境等千差万别，进而导致各国社会发展水平与政治发展程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性，所选择的政治建设发展道路也不可能完全趋同。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上，还体现在创造了民主在全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形式，“在民主进入工作实际进行操作技术层面后开辟了新的发展以及空间”。^[5]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6]

全过程民主制度是生态安全治理上的客观选择和必然选择，首先体现在民主的主体覆盖广泛，“全体人民”都处于民主过程之中，在体制和机制上帮扶弱势群体、为边缘群体提供参与渠道是保障生态安全建设惠及广大人民的必然选择。第二是民主参与的内容全面，人民可以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在生态安全政策决策、生态安全民主管理、生态安全问题监督等方面，都可以通过全过程民主制度实现约束与保障功能。第三是民主参与的流程完整，因为构建生态安全体系要求环节完整的特点，需要实现广泛、完善的生态安全制度，要求立法、行政到生态安全实践的完整流程；同时完整的民主参与可以引导参与群众的理性思考和交流，有助于推动生态安全文化的传播教育功能。第四是民主制度的过程完善，既有民主选举部分，也有选举后的实践、监管部分，防止形成西方式生态政治的“选举民主”和“身份政治”。

以生态安全法制建设为例，生态安全法律制度是生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生态安全治理工作能力进行实践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通过全过程民主制度完善的生态立法体系对于推进生态安全治理立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整个民主过程作为持续性民主与非持续性民主统一的过程，在持续性民主环节及时将群众的关于中国生态系统安全管理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和建议纳入地方立法规划，在非持续性民主的立法程序中基于地方生态环境安全治理需求，加强生态立法，形成多个层次的生态法规作为常态化生态安全治理的重要法律依据。此外，生态安全观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部分，要将生态安全建设纳入国家安全法制体系，利用国家安全主体的执法力量解决相关问题，例如通过加强管控防范境外生物入侵。

3 全过程民主在生态安全治理中的独特政治优势

“历史证明，人民民主是帮助中国人民实现繁荣和力

量的实际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在维护人民的生态利益方面，中国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生态安全治理优势可以从价值性、持续性和包容性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价值性方面，全过程民主对生态安全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优势。民主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价值，它包含着一个独立选择与合作行动的价值取向：为更好的生活、掌握自身的命运、自由和全面发展。^[7]要从社会根源上解决我国生态环境危机，就需要以科学的自然观重新开始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传统思维的限制下，人们在认识人与自然本应共生共存的关系时形成了割裂。转机出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有两个基础性的构成部分，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涉及的自然界与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两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动物的形状简单地符合它们所属物种的规模和需求，而人类知道生产任何物种的规模。”由于物体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用内在的尺度来测量，所以人类根据美的规律来塑造它们。^[8]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自然史向人类史”的转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通过人类劳动，现实的自然界变成人化的自然^[9]。而全过程民主包括了人化自然观的价值层面的内涵，是将生态安全扩展为民主主体的民主形态，代表了人民的生态权利，并且在应对生态安全问题上运用了人民民主的模式，在民主主体、民主内容与民主模式层面体现了“人化自然观”的价值取向。

其次，在持续性方面，西方模式的代议民主实践中，由于各种利益相关主体的矛盾以及普遍存在的“官商旋转门”现象，民主与效率无法兼顾是一种常态，长期存在生态政策持续性差的问题，无法高效应对生态安全的代际公平问题。而全过程民主制度因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特征、公民参与的全过程性特征，较好应对了代内和代际公平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根据人民的意志和法定程序选举产生的，代表着人民的总体立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实施的各种生态安全制度与生态安全政策经过了酝酿、讨论、制定等环节，充分考虑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诉求；之后经过我国完整的全过程民主制度程序，有完整的全过程参与实践，既有民主选举，也有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过程，从而在生态安全政策法规中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性，有效确保生态安全政策决议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些全过程民主环节实现我国生态安全问题的“外部利益”

的内化，有助于明确多个不同主体在生态安全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切实有效提高生态安全治理工作过程的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实现生态系统内的代际安全保障。

此外，在包容性方面，协商是政治活动中寻求共识、制定政策、优化治理的基本途径，而全过程民主具有内容上的整体性特征、党政部门的协同性特征，体现了较好的主体包容性。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协商制度正是政协制度是新中国最早的制度化政治组织形式，使不同政治身份的主体有参与到政策制定中的途径，形成平稳多样化的参与渠道。政府、个人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共同作为一个生态环境安全治理的参与主体，就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态热点和难点问题，直接通过协商的办法形成一致意见。协商民主使民主参与的直接性显著提高，有助于提高政府主导生态安全治理的效率，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提高生态安全治理效率问题的诉求。

以人民民主为起点，以协商促进民主，以持续性和非持续性民主相结合、包含民主全过程，这些特点决定了我国的全过程民主制度是最真实、最广泛、最适合新时代的民主制度，是推动我国建设具有重大风险化解能力、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与生态安全相统一的“五位一体”安全的生态安全型社会的建设中的关键性力量。

参考文献：

- [1] 蒯正明. 全过程民主视域下深化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路径探析[J]. 学术界, 2021年第6期, P180-186页
- [2] 鲁品越. 全过程民主：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1(5): 24
- [3] 西塞罗. 论共和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p75
- [4] 郝炜. 西方生态民主主义中的三种论证策略及其限度[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5年第2期, P12-16页
- [5] 唐亚林. “全过程民主”：运作形态与实现机制[J]. 江淮论坛, 2021, 1(3): 8
- [6] 习近平. 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新华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9154966826521697&wfr=spider&for=pc>[EB/OL]
- [7] 罗伯特·A·达尔、伊恩·夏皮罗. 论民主[M]. 李风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33、p81-82
- [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58; 81.
- [9] 马莉.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视域下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实践路向[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0年第1期, P83-92, 113, 127页